

云南文史

补文献之缺 开笔记新篇

朱端强

一般认为,笔记一体,始于汉魏,其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内容涵盖极广、体例较为灵活的文献载体。就其记载内容而言,大致可分为“专题”与“综合”两类。专题类笔记多以札记形式,专门记述或考释某一学术问题;综合类笔记则不刻意追求文体规范,遇有可写之处,信笔而成,体例多变,不拘一格。正因如此,不同专业的研究者与广大读者,皆可从中找到各自所需的资料,亦可欣赏到各自所钟爱的内容。

我们将古今滇人所撰笔记,以及记载以云南为主要内容的笔记,统称为“云南史料笔记”。这一文献群体数量庞大且分布分散,多属综合类笔记。然而,学术界对这一重要文献群体的深入研究尚显不足。尽管省内外出版界已整理出版过少量“云南史料笔记”,如《徐霞客游记》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等,但绝大多数云南史料笔记仍深藏于公私藏书之所,或散见于各类大型丛书之中,导致云南文献整理存在明显空白,学术研究亦面临史料不足的困境。

近日,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文学专家学者,逐步向社会推出古今云南史料笔记系列著作,系统整理、出版《云南史料笔记丛刊》系列丛书,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领域的一项创新之举。众所周知,历代笔记的分类与著录极不统一、规范,前人对某些笔记的界定亦不甚清晰,这充分说明笔记文献本身仍是中国文献学领域亟待关注的课题。因此,要科学地研究历代笔记,首先必须出版更多不同内容与风格的笔记作品。此前,国内已有出版社开展相关工作,如中华书局出版《历代史料笔记丛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》,上海古籍书店出版《清代历史资料丛刊》等。云南人民

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亦曾出版过罗养儒《纪我所知集》等若干涉及云南的单本笔记,广受读者欢迎。

遗憾的是:自民国以来,云南在系列综合类文献方面,先后出版过《云南丛书》与《云南丛书续编》《云南史料丛刊》等大型丛书,其中虽收录部分笔记文献,但数量有限,且并非专题性或系统性的笔记丛书,远远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。研究者与读者难以对分散的云南笔记文献进行集中研读与利用。有鉴于此,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《云南史料笔记丛刊》,此举值得点赞,亦值得关注。

这一创意的实施,不仅有助于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,更填补了云南文献整理与出版的一大空白。更为重要的是,它将从“云南史料笔记”这一独特视角,为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与整理作出诸多创新与贡献。其次,《云南史料笔记丛刊》的出版,将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、更新的史料,毋庸置疑,史料笔记的整理与注释,属于古籍整理的基础工作,而古籍整理又是历史与社会研究的基础与前沿领域。这类工作看似平淡,实则极为艰苦。然而,若离开了史料的前沿挖掘,仅在前人已公布的史料上做文章,如何进一步获取更多、更新的史料?没有不断拓展的新史料与新理论,科学研究又如何取得真正的进步?

据笔者所知,大量分散的云南史料笔记自

有其独特价值。它们大多属于综合性笔记。首先是作者众多,绵延不断。从古代至近现代,既有云南本土作者,亦有宦滇、旅滇、寓滇之人;既有达官显宦,亦有普通文人;既有汉族,亦有其他民族。他们并非刻意著文,而是就亲见亲闻,记录身边之事、人生感悟或研究心得,因而具有极强的真实性与较高的学术价值。云南史料笔记内容极为广泛,且不乏诸多独特、精彩之处,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云南的重要史事与著名学者的学术思想。

如方树梅的《师斋随笔》,所记皆涉云南,凡史事、地理、人物、文献、碑刻、古迹,无不包罗,堪称专门的云南掌故之书。《百人翰札》,系赵藩所辑师友来函,计三百八十通,涉及近百二十人。原书“小鸡波馆藏”,内容涵盖晚清时



云南史料笔记丛刊。作者供图

政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诸领域,兼具重要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。因翰札多书以行草,不便学者阅读使用,现点校兼施注释,利学界。袁嘉谷的《移山移笔》,论学衡文,自学术源流、思想衍变之大者,至一语一字、一事一物之细微,皆能以敏锐眼光作科学之探讨,见地独到。邓之诚《滇语》,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基,笔触温情而细腻,描绘出一幅丰富而立体的晚清民初云南社会图景。该书不仅生动呈现一方水土的社会肌理与生活气息,为理解该时期云南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参照,更彰显出一种独具温度的书写路径。

此外,明代徐栻著《滇台行稿》,游朴著《诸夷考》,木增著《云逸淡墨》,清代高翥著《滇孙》,许仲元著《三异笔谈》,吴大勋著《滇南闻见录》,段永源著《信征集》,近代杨琼著《滇中琐记》,陈古逸著《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》,钱文选著《游滇纪事》,秦光玉著《滇谚》,陈一得著《云南气象谚语集》,何秉智著《滇事拾遗》,谢彬著《云南游记》,胡嘉著《滇越游记》等,从不同角度记述、考证了云南奇特壮丽的山水、丰富多样的物产、特殊精湛的工艺,记载并评论了云南的社会经济、文化教育、民族习俗、古今传说等。云南古今著名学者张志淳、木增(纳西族)、师范、宴婷、陈荣昌、赵藩(白族)、周钟岳、由云龙、李根源、方树梅、罗养儒等所著的众多笔记,亦展现了云南诸多杰出的学术思想、人物逸事、民间民俗等,皆值得认真研究或品读。

我们谨以《云南史料笔记丛刊》的付梓为契机,期待各方持续发掘、甄选与整理更多优秀的云南史料笔记之作,以丰赡学术与文献之研究泽被当代读者与后世学人。

(作者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)

苍洱茶花 甲天下

——大理山茶花的文化谱系与历史记忆

魏向阳



本报记者 胡好雅 摄

民谣有云:“云南茶花甲天下,大理茶花冠云南。”大理素以“风、花、雪、月”四景闻名于世,然与缥缈难踪之风、雪、月相较,唯“花”最具形神之妙。而在苍山洱海万紫千红的繁花之中,又以茶花最负盛名、最具观赏之致。

大理山茶花,是驰名中外的山茶精品和名贵花木。云南山茶花之名,非自金庸小说始,实际上,早在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,王公大臣们就把茶花种植在御花园中,十七世纪,英国人自大理引种了茶花到白金汉宫后花园。英国女王把来自大理的茶花连同苍山大理石介绍给她的邻国君王,紧接着法国等欧美各国相继引种大理茶花。明代大学士杨升庵曾在大理凌墨挥毫写下“绿叶红英斗雪开,黄蜂粉蝶不曾来,海棠珠树无颜色,羞把琼枝照玉台”的茶花礼赞;在明代万历年间的《大理府志》中,更有“山茶谱有28品,最名贵者有花瓣如菊,层出不穷的‘童子面’;生长高不盈尺的‘恨天高’;花色紫而黑的‘紫袍’;艳如牡丹的‘牡丹茶’;红白相间的‘大花玛瑙’;九心十八瓣的‘狮子头’等等,其中‘恨天高’以开于红梅之先,凋谢于桃李之后而甲天下”的详细描述。《滇中茶花记》一书中还有“茶花最甲海内,种类七十有二,冬末春初盛开,大于牡丹,一望若火齐云集,如月蒸霞”的记载。

大理有“文化古城,妙香佛国”之称,白族人热爱生活,有爱花、爱美的传统。大理白族视茶花为美的象征,在家里的房前屋后遍植茶花,在衣服上也要饰以茶花,在衣服色彩的选择上,也喜欢用白衣配红坎肩,就像在春雪中绽放的山茶花一般。白族服饰,美观大方,朴实、健美,这样的服饰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审美观和对生活的热爱。据调查统计,大理州境内基围达三十五厘米以上的茶花树至少有五万多株,大理、巍山、永平、鹤庆等地拥有古茶树二百多株,特有品种恨天高和赛菊瓣、朱砂紫袍、大理茶、松子鳞、玛瑙等原品种为世界之最。至今在大理古城,仍有上百年树龄的山茶树,冬春时节花开之际千朵茶花竞相绽放。大理苍山西北和大理境内的山上生长着极为丰富的云南野生红山茶,是西南地区最为广阔天然的山茶花园。

徜徉于初春的大理城乡,无论是步入居家庭院,还是漫步公园景区,抑或是在寺庙古刹、农家小院,到处都能观赏到各种各样的茶花,城乡之间的锦簇花团宛若白族姑娘们秀美的脸庞,仿佛一片片五彩霞霓飘落苍洱之间,更显春意盎然。

还有一种据说是没有嫁接过的白茶花,洁白无瑕,纯真如玉,给人一种纤尘不染超凡脱俗的高洁纯净之美。每年农历的二月中旬,以“家家养花,户户流水”闻名于世的大理古城居民,都要举办一年一度的“朝花节”,在古色古香的古城街道上,四处邻里街坊都要展出自家最美最艳丽的花树,搭成一座座“花山”,相互比美争艳,整座古城街道因群芳争奇竞秀而五彩纷呈,成了鲜花的世界、鲜花的海洋。而在一座座花山、一片片花海中,最为亮丽丰美而引人注目、耀眼光辉,让大理人引以自豪和自豪骄傲的,就当数那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山茶花了。“松子鳞”“童子面”“恨天高”“紫袍”“牡丹茶”“红白相间的‘大花玛瑙’”“九心十八瓣的‘狮子头’”等等,琳琅满目、美不胜收,令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。

大理茶花大而多变,色彩极为丰富,据称现在品种已有近百种,可谓千姿百态万紫千红。大理的山茶花还有着外地茶花难以比拟的独特优点,就是花期较长,能吐蕊于红梅报春之前,而凋谢于桃李花开之后,冷艳迎春,奇甲天下。而如今的能工巧匠更是别出心裁,巧妙地把数种名贵的茶花嫁接在一棵棵古老的茶花树上,使数种茶花集于一树,争奇斗艳各领风骚,让中外游客大开眼界大饱眼福,为苍洱大地增添了不尽的艳丽风采和烂漫春色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、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历久弥新的技艺传承 云南云子

李友兰 青松

围棋源远流长,是中国的国粹。春秋时期孔子在《论语·阳货》中曾言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,难矣哉!不有博弈者乎?为之犹贤乎已。”其中的“弈”指的便是围棋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《弈旨》中首次提出“立象比德”的传统,将围棋与天道、地道、人道的“三才”思想融为一体,使其成为探究与引导人走向“天人合一”境界的方式。中国作为围棋的发源地,最好的围棋产自云南。云南围棋子简称“云子”,古时以云南永昌府(今云南省保山市)所产“永昌棋”品质最精,《明一统志》中说“永昌之棋甲天下”。云子作为云南传统的制作技艺,素有国宝之称,代表着中国传统哲学与静水流深工匠精神的融合,多次被作为“国礼”赠送给外国贵宾。在民国初年传统云子制作技艺曾出现失传,直至1974年,昆明

第十二中学校办工厂(今云南围棋厂)通过反复试验,成功复原了云子的传统配方与工艺,使这一古老技艺重获新生。2021年,云南围棋子(云子、永子)制作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云南云子代表着薪火相传的历史技艺。一方面,云子的生产始于唐代,盛于明清,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。清光绪十一年刻本《永昌府志》卷六十二中简略记载了烧制云子的方法,“其制法以玛瑙石合紫磷石研为粉,加以铅粉,投以药料,合而锻之”。由此成就了云子“黑如鸦青,白如蛋清”的独特质感。具体而言,云子之美有三,曰色、声、感。其色如玉,白子如米脂浮雪,黑子似清潭秋水,其声如磬,着盘声铿,脆而不浮,其感极柔,华润细腻,触手生温,这黑白二子,在棋枰上演说着无穷宇宙,在掌中则沉淀着时光洗练后的润泽。另一方面,一枚云子的生产需要经过12道工序的精细打磨,可谓滴水成棋,火中取宝。从原料配比、高温熔炼、滴料成型、退火研磨,每一步皆依赖工匠手腕功夫上的精准把控。其中“滴子”的工艺尤为关键,“长铁蘸其汁,滴以成棋”,一滴一滴之间,棋子浑圆无瑕,正面微凸,底面扁平,全凭匠人的多年经验与精益求精、微中取微的工匠精神。正是这指尖流转的方寸之间,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回响。

云南云子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。围棋文化的人滇与云南文化的出滇,佐证了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肌理相连,各民族共同创造、共同享有中华文化。以云南云子出滇而言,唐代傅梦求所作《围棋赋》有云:“枰设文楸之木,子出滇南之炉”。这是历史文献上最早提及云子的描述。明代凌濛初拟话本小说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,也曾提到“云南围棋子”,可见,云南云子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之久、影响之深。历代文人雅士、墨客骚人对云南云子青睐有加,将其视为陶冶情操、修身养性的怡情珍品,对弈之中,黑白错落之间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博大精深。以围棋文化的人滇而言,围棋中所包含的“制胜保德”“技进乎道”“数理思维”等传统哲学思想,也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,增强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。明朝在云南施行军屯制带来“约百万汉民入滇”,汉文化和以围棋为代表的娱乐方式在云南便有了广泛的受众群体,云南围棋文化的兴盛,也进一步促进了云南云子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与传播。可见,云子是围棋文化的重要载体,而围棋文化又折射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厚文化底蕴。

云南云子展现出与时代同频的生命力。云子的发展亦如棋局,要把棋局中的落子、活子和官子,融入时代发展的谋篇布局。其一,如今以云南围棋厂为代表的云子生产厂,在原有“老云子”配方的基础上以七彩云南为灵感研发出“云之蓝”“入圣”“珍珍”“紫黛”等新产品,将其置于阳光的透照下,蓝如洱海澄澈,紫若夕云凝霞,做到了技术上的守正创新,汲古润今。让传统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生命力,使跨越千年的智慧持续滋养着前行之路。其二,云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,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史文化的浓缩,对当今构建中华民族标识体系具有积极作用。习近平总书记指

出:“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,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,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”云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是云南的一张亮丽名片,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,也是助力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元素。

棋子只黑白两色,却包罗万象,棋盘纵横十九道,却变化无穷。一枚云子承载的不仅仅是古代工匠制作技艺上的巅峰,更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。宋代诗人苏轼曾在《观棋》中写道:“不闻人声,时闻落子。纹枰坐对,谁究此味”。黑白棋子若昼夜更迭,落子时阴阳流转,提子时万物消长。棋盘之中通过黑白棋子的布局,展现出“在约思纯”“负阴抱阳”“奇正相生”“抱法处势”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等,儒、道、兵、法、墨五家的辩证哲学,这与云子的似黑而蕴青,似白而含润,外如糙石,内藏锦绣的君子之风相契合。“气是生命线,眼是生存权”,执子落棋争的是胜负,悟的却是天人合一的平衡之道。

[作者单位: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;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创新发展中心(重庆大学)2025年度文化育人创新研究大学生专项课题“数智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实践路径研究”(课题编号:25JCFQX085)的阶段性研究成果]



“昆明工匠”刘廷举正在制作“云子”。本报记者 郎晶晶 摄